

# 飛鵝山上

## ——敬悼余光中老師

● 樊善標

### 一 初識余老師

那該是1983年秋天至1984年夏天之間的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就讀一年級，某天和同學路經本部校園「百萬大道」上的碧秋樓，我對那位同學說，剛才在我們身旁走過的就是余光中了。當時中文系的辦公室在碧秋樓，那人正從樓裏出來，身量不高，步履輕巧而穩定，神情嚴肅。不過後來愈想愈懷疑，究竟那天見到的是余光中，還是另一位外形有點相似的老師劉殿爵教授呢？

余光中老師的名字我在高中就知道了。一位中文科老師說近年會考設題愛用余光中、朱光潛的文章，小息時我到學校圖書館找出余光中著的《逍遙遊》，但根本看不懂他在說甚麼。升上大學，認識了同班的王良和。他初中開始寫作，得過不少青年文學獎的獎項，從他那裏我第一次聽到西西、鍾曉陽……聽得更多的是他正在全力揣摩的余光中老師。余老師的文字風格、文學觀點我都是從良和的介紹裏有了初步印象的，於是我也開始期待二年級上學期余老師任教的「現代文學」了。

1980年代中期，中大中文系的課程以古典科目為主，一、二年級必修四個學期由先秦到晚清的文學史，兩個學期的「現代文學」則是二年級的選修科，有點補足新文學史知識的意味，但不要求全選。那年余老師和黃維樑老師各教一學期，余老師教新詩、散文，黃老師教小說、戲劇，我的興趣在古典科目，只修了上學期，淺嘗輒止。「現代文學」表面上是分文類講授，但余老師以尹肇池（即溫健騮、古兆申、黃繼持三位的諧音合名）編《中國新詩選》及一本現在已難買到的李采塵編《中國現代散文選》作教科書，按篇講評，仍是順時序而教，重點在五四至30、40年代。余老師表達異常清晰，評析作品

單刀直入，極少不相干的閒話。講課的內容有些已寫成論文，收於《青青邊愁》、《分水嶺上》二書，但還有頗多精微之論隨風而逝，未免可惜，例如說何其芳的散文句式歐化而冗贅，舉〈哀歌〉為例，「像多霧地帶的女子的歌聲，她歌唱一個充滿了哀愁和愛情的古傳說，說着一位公主的不幸，被她父禁閉在塔裏，因為有了愛情」，語病嚴重，儘管作者是憑記憶借用「一部法國小說中的話」，也說不過去。但何詩的收筆往往有佳句，例如《歲暮懷人之二》：「西風裏換了毛的駱駝群／舉起四蹄的沉重／又輕輕踏下，／街上已有一層薄霜。」同一年還有一個「創作」選修科，余老師教新詩、散文，小班上課，機會難逢，但我全無創作經驗，不敢選讀。翌年升上三年級，余老師回到台灣，再沒機會修他的課了。

## 二 講台下的余老師

在短短一學期的課堂上，余老師當然認不出我這個平凡學生。他對我有點印象，應該是1992年應新亞書院邀請回到中大作一系列的演講。當時我已碩士畢業，留校當導師，黃維樑老師派我接送余老師，並在一場面向中文系學生的演講中充當主持。此後，余老師到港時，我也常在正式場合中和他見面，但更愉快的是私下和余老師、師母吃頓飯，或在他們的酒店房間談一會，那幾乎都是黃秀蓮師姐的安排。

私下聊天時，余老師不像在講台上那樣光芒四射、字字珠璣，往往家常話說了幾句，師母就接過話題。師母語音清婉，說話不徐不疾，條理之清楚不亞於余老師上課時，而且她對人對事都有鮮明的見解，有時老師補充一兩句，但很少意見不同。想來他們平日無所不談，甚麼都討論透徹了。



2013年12月，筆者（右）和散文家黃秀蓮師姐（左）在沙田凱悅酒店沙田18中菜廳與余老師、余師母午膳。（圖片由樊善標提供）

余老師曾送給我好幾本詩集、散文集，以及其他評論他的書，從台灣寄來的信封上一望而知是他剛正有棱角的楷體。後來從他的文章得知，但凡贈書，不僅寫信封，連打包、付郵都是他親自動手。可是我沒有收過余老師的信，幾次和他在電話裏聯絡，都是師母打來，接通了交給余老師的。好像只有十多年前的一次，余老師直接打來，開口仍是那緩緩的語調：你那篇寫我的論文是對的。停了一下，又說：某某人在某大學畢業，想到中大來唸博士。我頓時慌了手腳，因為中文系的成規是統一錄取，我無權決定收甚麼學生，只好把報考程序講了一遍。余老師沒有點破，又談了一些其他話才掛斷，絲毫未表露不快，他的體諒我一直心懷感激。

最後見到余老師是2015年，這年他兩次來香港。先是新亞書院邀請他擔任「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講者，兩場演講外加一場詩歌朗誦會，反應熱烈自不待言，但應付頻密的活動看得出他有點累了。活動結束，老師和師母回到高雄，不多久香港城市大學鄭培凱教授發來該校文化沙龍的邀請，嘉賓赫然是余老師。鄭教授是余老師早年的學生，在城大任教多年，主持的文化沙龍非常有名。以往幾次見邀總是陰差陽錯地去不成，這次無論如何不能錯過了。文化沙龍的前段是自助餐，以到會方式在一個活動室裏進行，我認識的人不多，隨便挑了個位子坐下，師母看見招我到他們那一桌，仍是說些家常話，也不免談到時局的不寧。沙龍後半是余老師演講，題目記不起來了，那天的活動可能相對輕鬆，余老師精神頗佳。

2017年，台灣的中山大學為準備慶祝余老師九十壽辰，特來香港拍攝「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師母來電囑我帶拍攝團隊到他們當年的宿舍取景，余老師「香港時期」的許多詩文即寫於那個前臨吐露港、遙對八仙嶺的書房裏。我翻看日曆，余老師的生日在星期六，應該可以到高雄參加慶生會，並欣賞紀錄片首映。怎料中山大學的慶生會在生日前三天舉行，我因為上課無法出席。然後就是12月初，黃秀蓮師姐告知余老師小中風住院，她本已訂了機票到台灣為師母祝壽，正好探望老師。再然後就是秀蓮陸續傳來余老師病情惡化的消息，至12月14日溘然長逝。

### 三 香港山水因緣

12月29日參加完高雄的公祭後，回到香港的家裏，已是凌晨1點，幾個小時後就要為中大中文系校友會的「重尋余光中山水因緣」文學散步帶隊導賞。那是9月時開始籌備的活動，我在活動介紹裏這樣寫：「余光中教授在七、八十年代任職本系，課餘訪尋香港郊野，範水模山，寫成眾多膾炙人口的香港地景文學名作。歲餘得暇，且讓我們跟隨余老師的步迹，在現場重讀〈船灣堤上望中大〉（大尾篤）、〈牛蛙記〉（中大校園）、〈飛鵝山頂〉（飛鵝山）諸詩文，印證他的香港山水因緣。」在電郵寄給參加校友的資料冊上，我又臨時添了一句：「謹以此次行程記念余光中教授。」實在感慨萬分。

我們首先到大尾篤船灣淡水湖的長堤上，遠眺中大山城，誦讀《船灣堤上望中大》(1977)。「山盤水轉，再回頭來路已彼岸/波遠風長那對面/隱隱並矗的水塔下/背着半下午秋陰的薄光/高高低低斜錯的那些層樓/那一座是我的層樓啊層樓？」這是寫於1977年12月的詩作，當時余老師在中大任教了三年多，已經適應了環境，並好奇地探索校園以外的地方。這首詩上承《白玉苦瓜》(1974)已臻圓熟的詩藝，語言典雅自如，每行長短參差，但自有一氣貫注的節奏感，結構上則把空間的距離轉化為時間的流駛，預言「十年後」離港他去，「隔海回顧如前塵」。不想僅八年就下山了。

接着唸《不忍開燈的緣故》(1984)：「高齋臨海，讀老杜暮年的詩篇/不覺暮色正涉水而來/蒼茫，已侵入字裏和行間/一抬頭吐露港上的暮色/已接上瞿塘渡頭的晚景……」從中大六苑二B宿舍的書房遙望，正是我們站立之處了。這是1984年中的作品，已接近余老師「香港時期」的尾聲。曾有人批評余老師此一時期的詩作鮮少呈現香港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氣息，這未嘗非事實，卻不應忽略了作家的處境和追求。余老師移居香港，同時由外文系轉到中文系，生活、教學和研究都需要大規模的調整，而處身的又是當時遠離塵囂的沙田山中，所以「香港時期」的詩作不僅語言和意象愈趨古典飄逸，更時見與李白、杜甫、蘇軾等古代詩人神交往還，這當然因為研讀有得，才能妙入古人的世界。但余老師還有一系列重評五四經典作家、探討中文書面表達、評論古今遊記寫作的文章，都是因應新的學術崗位而開關的研究領域。其時余老師介乎四十六至五十七歲之間，學問識見已達成熟階段，體能又足以應付驅馳，乃有如此豐富的創作和研究成果。

從大尾篤乘車到中大，我們坐在聯合書院的大草坪上，朗讀《沙田之秋》(1974)和《沙田山居》(1976)。余老師初到中大是應聯合書院之聘，擔任該院中文系的系主任，當時的辦公室即在草坪側的大樓上。《沙田之秋》是余老師居港的第三首詩，《沙田山居》則是居港的第一篇抒情散文，兩者在他的創作歷程以至香港文學史上都有非凡意義。前者延續余老師早已蜚聲文壇的鄉愁主題，但在這裏抓住了一個連結所在地和中國故土、卻不能任他隨之而北上的事物——九龍鐵路——提煉成為動人的意象，較之以往詩文中隔着台灣海峽的鄉思，別有一種強烈的張力。後者寫於一年半之後，有趣的是，文章似乎刻意避免發展為另一篇鄉愁之作，在想像的觸鬚伸展到香港的邊界時戛然而止，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大校園之奇美迷人仿若仙境(參見樊善標：《余光中香港時期的抒情散文》，載《爐外之丹：文學評論及其他》[香港：麥穗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85-90)。

余老師在詩集《與永恆拔河》的〈後記〉裏說，他居港四年半，所寫的詩已不限於「鄉國之思的時空格局」。其實同是「香港時期」的〈沙田七友記〉(1978)、〈催魂鈴〉(1980)、〈牛蛙記〉(1980)、〈我的四個假想敵〉(1980)等散文可能更膾炙人口，「幽默諧趣」在一般讀者心目中或已取代了沉重悲情的「自傳式抒情

散文」，成為余氏文風的正字商標了。這些，證諸〈沙田山居〉，當是早有轉型的自覺。而從香港文學的角度看，余老師把地方風景寫進詩文裏，又匯聚諸家散文編成《文學的沙田》，雖然並非前無古人，但這種欣賞、愛惜在地的態度，在移居香港甚至長居香港的作家裏其時也不多見。香港地景文學中，余老師自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在校園吃過午飯，我們再啟程往今天導賞路線的高潮：飛鵝山頂。途中我們誦讀余老師告別香港的《十年看山》（1985）：「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是這些青山的背後/那片無窮無盡的後土/……看山十年，竟然青山都不曾入眼/卻讓紫荊花開了，唉，又謝了/……每當有人問起了行期/青青山色便哽塞在喉際/他日在對海，只怕這一片蒼青/更將歷歷入我的夢來」。可是我指出，這種「人難再得始為佳」的懊悔，雖然充滿戲劇性，但從前面提過的詩文看來，卻不是真相，余老師早就投入在地的生活了。此詩的收結說：「十年一覺的甜甜，有青山守護/門前這一系列，唉，無言的青山/把囂囂的口號擋在外面」，香港在中國歷史裏微妙的地位，余老師十年棲居的感恩，皆情見乎辭。再讀《老來無情》（1985）：「……每當我危立在飛鵝山頂/俯瞰一架架越洋的巨機/在壯烈的尖嘯聲裏/一揚頭便縱上了悠悠的雲路/不敢想某月某日，其中的一架/註定要武斷地挾我飛去/飛去了我，卻留下了飛鵝」，我們就到達飛鵝山的山下了。

〈飛鵝山頂〉（1985）是余老師在香港所寫散文登峰造極之作，在他全部散文中也屬於最出類拔萃那幾篇之一。此文固然不乏文字煉金術士的當行本領，全文敘事的起伏照應，灰線草蛇，置諸古文名篇之林也不遜色，但更重要的是情感之飽滿淋漓。他在登山途中發現了國父孫中山母親楊太夫人的靈墓，拜謁之後，頓覺荒山野道有情起來。踏足峰頂時再有一發現：「像一場夢。在沒有料到的距離，從不能習慣的角度，猝然一回頭，怎麼就瞥見朝朝暮暮在其中俯仰笑哭的『家』，瞥見了自己身外的背影？」《船灣堤上望中大》的一幕再度上演，但這次不是預想，而是成真。文末以一個纏綿的長句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這三片土地一筆縮住，宣布此心永遠縈迴於此三處，並無輕重之別（參見樊善標：〈三位散文家筆下香港的山——城市香港的另類想像〉，《中國現代文學》，第19期〔2011年6月〕，頁132-38）。

這天乾爽晴朗，雖然有點煙靄。我們一路上頂禮過楊太夫人墓，由觀景台俯瞰舊啟德機場和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密匝層樓，從另一方向遙望吐露港畔的中大山城，最後，站在此行最高點的氣象站鐵欄外，攤開手掌遮擋漸漸傾斜的日光，同時向我們的老師致敬，滿山潔白的蘆葦一齊晃動。